

中國思想界的
奧伏赫變



子剛

改訂實價四角五分

有 所 權 版

變赫伏奧的界想思國中

版 出 月 六 年 五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著 者	王 靈 皋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國 幣 七 角

『海格爾關於某種數理的公式，說道，常識認為不合理的，就是合理，而常識的合理，就是不合理。這句話在此地也適用。』

序

五四運動浪潮中，中國新興的急進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提出了擁護『賽先生』與『德先生』一個口號，在這個口號的進軍中，否定了建築在封建社會基礎上的一切舊禮教，舊思想；就是舊思想和舊禮教的『奧伏赫變』。然而舊思想舊禮教並不是一下子可以剷除乾淨的。大戰而後，歐洲的資產階級的學者，遂把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分割殖民地的戰爭罪惡，完全架在科學身上，於是咀咒科學之聲，囂然四起。中國的學者如梁啟超先生及張君勱輩也就跟在這些玄學鬼後邊搖旗吶喊，丁文江，胡適諸氏則扛起擁護科學的旗幟，與之對壘：

『硯上龍蛇走，

筆底戰場開。

於是而有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可參觀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交鋒而後，自然是科學派占了上風，玄學派受了打擊，也可以說：科學思想否定了玄學思想，即玄學思想的奧伏赫變。但是梁啓超先生及張君勱一派的玄學和胡適、丁文江諸君的科學實在是五十步和百步，因為他們都逃不出形式邏輯的圈子，也就是說，牠們不過是唯心論中的兩個支派。却是在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當中露出了一個『蒼頭異軍』即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思想。這一思想不但與張君勱等的玄學勢不兩立，即與胡適輩所代表的形式邏輯的科學思想也處於絕對不可調和的地位。鬥爭是不能避免的，於是而有李季君的『或是實驗主義？或是辯證法？』的出現（可參觀李君在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我的生平。）這一著作便是中國的唯心論的科學思想的一個否定，即牠的奧伏赫變。著者的『兩個思想方法的對照』也是這一鬥爭中的一部分的產物，所以我把牠改名爲『中國思想界的奧伏赫變』並略加刪補，又把王禮錫君的答書附在後面，印

成小冊子，以求教於當世。

至於『奧伏赫變』Aufheben 這個字是哲學上，尤其是辯證法中一個極重要的概念。牠在言語上有兩重意義，一方面的意思是『保存』aufbewahren，『保有』erhalten，同時又有『使之停止』aufhören lassen 『使之終熄』ein Ende machen 的意思。就是說：奧伏赫變自身雖然就包含着 Negative，但並不是把舊有的思想乾脆地壓根兒完全拋棄，而是排斥舊的當中之不適於新的生存的部分，而保留其可保留的部分。不過所保留的已經失却牠的直接性，這也就是說，從舊的母胎中產生出新的，並由新的承襲一切舊的遺產，但這些被承襲的遺產只是更高的發展之一種積累的構成部分，已失却牠的原來作用，這就是由量變到質或由質變到量的無窮的過程中一種必然現象。這種現象在自然界如是，在人類的思想界亦復如是。現在和將來的思想鬥爭必定要逐漸展開，思想界的奧伏赫變，也就無時或息，本書所說，只是一個端倪而已。

一九三六，四，七。著者。

中國思想界的奧伏赫變

一

王禮錫先生在他主編的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那一期（第四五期合刊）上，有這樣一段話：

『自帝國主義的外力在中國社會發生作用以來，中國思想界發生兩個激烈的戰爭——人生觀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一個過去了，一個正在造着槍林彈雨的混戰。』

『這兩個論戰的接踵而來，是表示中國社會的變革之迅疾。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幾個不同之點，認識這兩個論戰在經濟的變革上是什麼意義。』

『一』人生觀論戰，一方是科學，對手方是玄學；在中國社會史論戰裏，這兩個對手方都不存在，因為到現在科學已成爲常識的「真」，玄學已成爲常識的「幻」。

『二』在哲學的觀點上，人生觀論戰，一方是極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極端的唯物（點是我加的。靈泉）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的鬥爭，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

『三』人生觀論戰是以普遍的真理爲研究對象，各有可根據的現成的理論；中國社會史論戰是以中國的實際的動的社會爲研究對象，沒有可抄襲的藍本。

『四』在方法上，人生觀論戰一方面是以形式邏輯做武器（雖然他們也以形式邏輯爲不足，但終跳不出形式邏輯的圈子。）一方面是以玄想做武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都是以唯物的辨證法做武器。（點是我加的。靈泉）——

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頁五——六。

我劈頭引了王先生的一大段文章，好像令人摸不着頭腦，而且與介紹海格爾的歷史哲

學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其實不然。因為王先生這一大段文章中包含着三個極重要的問題並且在在與我要介紹的海格爾的歷史哲學及我所要在本文中論列的哲學問題有密切的關係不能不首先提出來說一說：

王先生說：『現在科學已成爲常識的「真」，玄學已成爲常識的「幻」。』這話恐怕是王先生一時的快意之談。所謂常識，自然是尋常人的知識，即普通一般人的知識，就是說，現在中國人，至少是知識界，青年界都知道科學爲真，玄學爲妄，都知道注重科學，鄙棄玄學，都知道利用科學，不致再被玄學鬼所迷，實在說來，中國思想界，青年界能以真正瞭解科學與玄學的區別，再進一步明瞭科學與玄學在西洋思想界的關係（以前的和現在的）恐怕還不怎麼樣多，常識更可知而知。資產階級在他攻擊封建制度和此種制度之上的建築物，哲學，文藝等等的時候，對於玄學自然激烈地批評，對於科學自然盡量地利用。然而一到了政權在手，他要維持他的階級利益，玄學又變成他麻醉被剝削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一個最有效的毒劑。所以歐洲所謂文明國家，一方面，他的科學

儘管發達，一日千里，一方面，他的玄學仍然有牠的堅固的合法的地盤，各大學中都有牠的寄生處，此柏格森所以有名於巴黎，而杜里舒所以馳聲於德國。就以個人而論，杜里舒是一個自然科學家，同時他又是一個玄學家，這正是十足地表現資本主義社會之不能盡量地利用科學，因為他本身包含着極大的矛盾，玄學鬼是與牠相終始的。至於中國，還早着呢！統治階級正在高唱他的『尊孔』（何鍵），『禮佛』（戴季陶），提倡忠孝節義，以及所謂東方文明，距真正普遍地利用科學（即到常識知其爲『幻』的程度）真不啻十萬八千里，統治階級是永遠不會盡量地利用科學的，就因為他需要利用玄學。（這是）

③ 王先生說：『在哲學觀點上，人生觀論戰，一方是極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極端的唯物。』這話是對的，但是說：『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的鬥爭，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這話就有商量的餘地了，因為我們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就碰到了唯心論的餘孽，你看：

『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爲着各階

級的畸左畸右，形成許許多多的意見』（拙著序幕）。讀者要接受或反對這許多不同的意見，必得先置身於作者的階級意識中去切實理解其試解的意義，然後跳出其階級意識的牢籠之外，加以純客觀的體認，然後才不虛讀，然後才可得到有價值的批判……

我們既已『置身於作者的階級意識中去切實理解其試解的意義』，那已經是一種『客觀的體認』，爲何又『跳出其階級意識的牢籠之外』？既『跳出其階級意識的牢籠之外』，又怎樣『加以純客觀的體認』？除非『跳出其……』的『其』字，是指讀者而言，才有意義，然而這末一來，前後又成倒置，因爲只有先『跳出』自己的階級意識，然後才能置身於作者的階級意識。而且要想切實理解一作者的試解的意義，不但要明瞭作者的階級意識並且讀者自身的階級立場也要異常堅定，才能充分獲得客觀的體認。王先生這種說法，不但有點唯心的（主觀的）傾向，並且有點混亂的情形，幾乎不能令人理解。這還不算，或則可以說是我故意地周納，現在我再設一個問題，假使中國社會

史的論戰的結論一方面的主張是『是』，那末，另一方面的主張一定是『非』了，是的方面定然是客觀的，唯物的，那末，非的方面恐怕就有主觀的，唯心的危險了。而且既然說要我們讀者置身於他們作者的階級意識中，那他們作者的文章都是由他們各階級的不同意識出發，就是各由其主觀的見解出發，這豈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暴出他們主觀的而非客觀的，唯心的而非唯物的傾向嗎？他們並未曾客觀地分析中國社會史的真實現象，只不過各由其階級的主觀立場出發而描寫他們各人一相情願的中國社會史罷了，這是研究王先生的說法之必然的結論，這是二。

王先生說：『人生觀論戰一方面以形式邏輯做武器，一方面是以玄學做武器，』就當時他們論戰的情形說是對的，因為玄學派的大將張君勱以為『人生者，變也，活動也，自由也，創造也。試問論理學上之三大公例（曰同一，曰矛盾，曰排中）何者能證其不合乎？論理學上之兩大方法（曰內納，曰外釋）何者能推定其前後之相生乎？』（胡適孫行者與張君勱）其實邏輯的推論，誰也不能完全擺脫，尤其是在日常生活

中，且張君勱雖然說是『人生觀不爲論理方法與因果律所支配』，然而他又說『夫事之可以預測者，必爲因果律所支配者也』，『人類目的，屢變不已；然據既往以測將來，可以深信而不疑』，這豈不是頂刮刮地邏輯推論麼？無怪乎胡適之（所謂科學派的論戰領袖之一）奚落他『始終不會脫離邏輯先生的一件小小法寶——矛盾律——的籠罩，哈哈！』至於胡適輩雖然以科學反對玄學自豪，然而形式邏輯終久跳不出唯心論的圈子（因爲實驗主義講到哲學根本問題，牠就要碰壁，要陷到玄學的泥淖之中，此是後話，暫且不提。）至於王先生說『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是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那就未免太牽強了，太危險了，因爲這句話的本身就犯了『形式邏輯』的毛病；王先生只看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人口頭上都在喊叫唯物的辯證法，而不考察他們爭辯的內容與唯物的辯證法和階級的關係，遂把唯物的辯證法，看做一種鄉愿似的，以爲人人可以利用牠做武器，實在錯了。自從一九一七年以後，世界革命潮流的震動，搖盪了全人類的心靈，唯物史觀，唯物的辯證法這一思想方法，也就跟着革命狂潮，掀起全人類思想界的注

意，無論識與不識，莫不以唯物的辯證法相號召，這是一個事實，甚至各派理論家無論他主觀上願與不願或能與不能，都莫不挂着唯物的辯證法的幌子，以博讀者的歡心。但是，實際上，究有幾人能以而且願意真正了解，能以而且願意真正運用，實在是一個問題，我們要承認這一事實。就拿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內容來看，我們可以隨處碰見這樣的事實的證明，他們筆下，口頭，自然都挂着唯物的辯證法的招牌，然而事實却恰恰相反，譬如，孫倬章先生所鄭重取材的任曙先生的中國經濟研究，就是一個好例；孫先生說：

『帆船足以代表封建經濟的交通工具，輪船足以代表資本主義的交通工具，而中國歷年的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一八七五年，爲八五與一五之比，至一九二六年則爲九八與二之比（自註見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140）可見資本主義摧毀封建經濟之力甚速，交通方面的封建勢力，只殘留百分之二，幾已達於零點了。我們又以錢莊代表封建經濟，銀行代表資本主義，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錢莊與銀行投資本的百分數，一九一

二年爲六八與三二之比，至一九二〇年則爲三七與六三之比（自註同上書，

P.141）——頁八一九。

這在表面上，即從形式邏輯的推論法看來，『帆船』自然是『封建經濟的交通工具』，『輪船』自然是『資本主義的交通工具』，帆船出入全國的噸數的百分數比之輪船出入全國的百分數僅僅佔到百分之二，那末自然是資本主義佔絕對優勢，封建經濟幾『等於零點了』。從形式邏輯的推論法看來，『錢莊』自然又是『代表封建經濟』，『銀行』自然是『代表資本主義』的經濟；錢莊的每年投資的百分數比之銀行每年投資的百分數，既然只佔百分之三七，『封建勢力幾零落了一半』，那也可以說資本主義佔着壓倒的優勢了。不錯，是的，然而只不過說了一半的真理，因爲在資本主義佔優勢的社會中，不但輪船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的交通工具，即號稱封建經濟的交通工具，也變成資本主義商品流入內地或從內地吸收原料品的補助工具，不但銀行是資本主義投資的機關，即夙稱封建經濟的錢莊，亦將變成財政資本與工業資本伸入內地和鄉村的最有效力的工

具。又如朱新繁先生和陶希聖先生討論『中國封建制度究於何時開始破壞的呢？』這一問題時，自己答道：

『……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即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對中國開始商品侵略以後。但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中國封建制度雖然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已經開始破壞，可是一直到現在，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依然佔着主要的作用。』（中國社會史論戰號，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

性的討論。）

注意！一個辯證法的研究者，首先要注意量與質的問題，既名曰殘餘，就不得說佔某一物體或某勢力之大部分，只能說是一小部分，退一百步說，也必須承認這一常識所能做的推論，既是只能算是一小部分，那牠在牠所處的環境中就佔不了優勢，這也是形式邏輯的ABC所能知，不必訴之於辯證法。然而朱先生竟然說是『殘餘』佔了『優勢』，不但爲唯物的辯證法所不容，亦且爲形式邏輯所不許，我們且看馬克思怎樣說：

『在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所支配的社會狀態的內部，即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也爲資本主義的觀念所支配。』（Karl Marx: Das Kapital, Dritter

Band, erster Teil, Seite 14）

爲什麼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也爲資本主義的觀念所支配呢？自然是他的生活的鍊子已經操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大機輪中，在這裏，就是說，雖然是封建經濟的錢莊與封建經濟的交通工具的帆船，但是現在牠的命運却完全操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的銀行與資本主義的交通工具的輪船的運行中。明白這一點，那末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的結論，究爲誰屬，即現在的中國社會果爲資本主義佔優勢呢，還是封建勢力佔優勢這一問題，當可迎刃而解。這樣，才是唯物的辯證法的了解，這樣，才是真是拿『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不然的話，那只可說是『唯物，』而不能說是『唯物的辯證法，』僅僅唯物，還不免要走到唯心論的歧途呵！（這是三）

推論王先生的意思，必然是：科學與玄學之爭，唯心與唯物之爭，都已成爲過去，都已